

樊树志

晚明史



1573—1644

上

樊树志

晚明史

1573—1644

上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史:1573—1644. 上/樊树志著. —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309-10564-3

I. 晚… II. 樊… III. 中国历史-研究-晚明 IV. K248.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7311号

晚明史:1573—1644. 上(第二版)

樊树志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5.25 字数 558千

2015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564-3/K·474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① 晚明史(1573—1644). 上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4

978-7-309-10564-3

目录

上卷

导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1

一、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与晚明社会……………6

1. 新航路的发现与葡萄牙人的东来 / 6
2. 以澳门为中心的晚明对外贸易 / 17
3. “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 27
4. “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 41
5. 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 57

二、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65

1. 关于集市与市镇 / 65
2. 江南市镇的发展与分布格局 / 72
3. 江南丝绸业市镇与丝绸贸易 / 93
4. 江南棉布业市镇与棉布贸易 / 111

三、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126

1. 耶稣会士的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 127
2. 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 135
3. 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传播 / 141
4. “西学东渐”与晚明知识界的反响——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 153
5. “西学”与王学、东林、复社——李贽、邹元标、冯应京、冯琦、方以智 / 161

第一章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175

- 一、张居正与徐阶、高拱·····177
- 二、顾命大臣内讧：张居正、冯保与高拱斗法·····186
- 三、“王大臣案”——张、冯权力联盟的强化·····202
- 四、万历新政的展开·····209
- 五、余懋学、傅应祯、刘台与政治逆流·····217
- 六、围绕张居正“夺情”的政治风波·····226
- 七、新政的深化：财政经济改革（上）·····242
- 八、新政的深化：财政经济改革（下）·····256

第二章 明神宗：十岁登极的小皇帝·····271

- 一、从皇太子到小皇帝·····273
- 二、视朝、日讲与经筵·····282
- 三、大婚·····302
- 四、张居正归葬·····309
- 五、耕藉礼与谒陵礼·····317

第三章 张居正之死与明神宗亲政·····327

- 一、张居正之死·····329
- 二、斥逐冯保·····335
- 三、亲操政柄·····342
- 四、围绕刘台平反的纷争·····347

五、 辽王案与查抄张府·····	353
六、 申时行辅政时期·····	365
第四章 万历三大征·····	383
一、 平定宁夏哱拜叛乱·····	385
二、 东征御倭援朝·····	394
三、 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	412
第五章 册立东宫之争与“妖书案”、“挺击案”·····	421
一、“争国本”的由来·····	423
二、 神宗的宫闈生活与酒色财气·····	428
三、 册立东宫之争·····	435
四、 围绕“三王并封”的纷争·····	446
五、 皇长子常洛的册立问题·····	455
六、“妖书案”·····	461
七、“挺击案”·····	473
八、 福王之国的前前后后·····	482
九、 聚敛财富：矿税太监横行·····	489
十、 临清民变、湖广民变及其他·····	501
第六章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	513
一、 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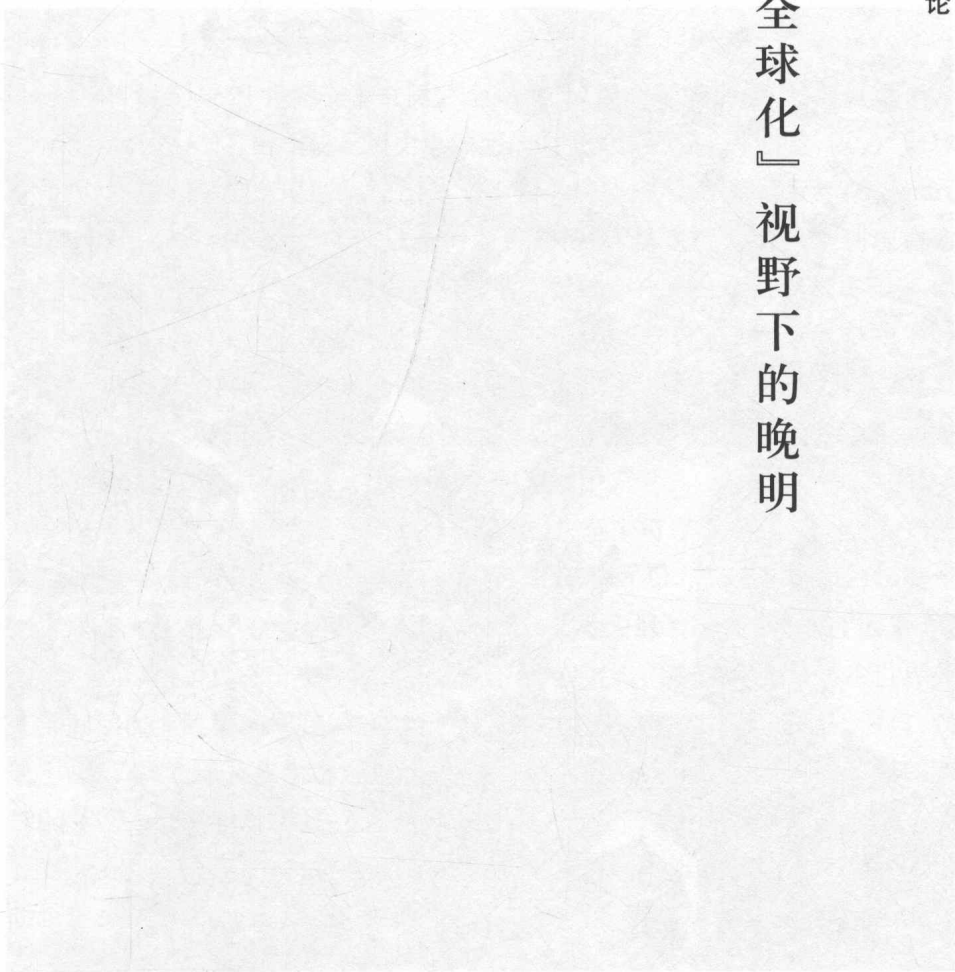
- 二、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522
- 三、“东林党”论质疑——关于“东林与浙党”……529
- 四、东林书院如何被诬为“党”？……537
- 五、东林非党论——兼论《东林党人榜》与《东林点将录》……545

表 目

- 表 1 1600 年前后澳门、长崎间中国货物贸易及利润率……23
- 表 2 1577—1644 年马尼拉每年进港船数统计……52
- 表 3 1586—1645 年马尼拉港每年平均征收进口税额……54
- 表 4 嘉靖七年至隆庆五年太仓银库收支数……243
- 表 5 万历清丈耕地增额数……255
- 表 6 万历年间邯郸县税粮、均徭、里甲折银统计……260
- 表 7 万历年间邯郸县地亩征银统计……260
- 表 8 万历年间邯郸县人丁征银统计……261
- 表 9 万历年间华北一条鞭法实施状况……262
- 表 10 隆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太仓岁入银两及指数变化……268
- 表 11 万历年间福王府庄田分布……487
- 表 12 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矿税太监向内库进奉金银数量……494
- 表 13 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太仓收支状况……497

导论

『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晚明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苏州附近市镇

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交替之际，“全球化”成为时髦的话语，然而局限于方寸之地功利的人们，由于缺乏历史纵深感的眼光，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全球化”仅仅是当今世界出现的现象。其实不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尖锐地批评“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并认为“在近代早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①。他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1800 年)》的导言中，引用了弗兰克·珀林(Frank Perlin)的观点：“‘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较早时代有组织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反)，在市场计算机化的时代只不过更明显罢了。”^②

确实如此，“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它至少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作出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探讨。他们指出：“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③。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后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迪

①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91 页。

② Frank Perlin, *Unbroken Landscape: Commodity, Category, Sign and Identity; Their Production as Myth and Knowledge from 1500*. Aldershot, U. K.: Variorum, 1994, pp. 98, 102, 104, 106. 参看《白银资本》中译本，第 89、498 页。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全球化：来龙去脉》，陈昌升摘译，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 年第 10 期。

亚士和伽马等葡萄牙人开辟了抵达亚洲的海上航线,麦哲伦率领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从而宣告了东西半球相互隔绝的历史的结束。此后……世界市场也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许多地区。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量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①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已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的论著《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这些“世界性帝国”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但没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性经济”。到了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②。因此沃勒斯坦把他的大著的第一卷题目定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起源》,他认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我们所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它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像一个大帝国那样幅员辽阔,并带有其某些特征。它却是不同的,又是崭新的。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的一种社会体系,而且这正是现代世界体系与众不同的特点。”^③

与此同时,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概念与历史,他认为“世界经济”(economic mondiale)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同社会、文明、国家乃至帝国一样,自古以来,至少很久以来,经济世界业已形成”,“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但在扩展了地域以后,还必须加以控制,不管这是大西洋的波涛还是美洲的土地……在两个相互警惕和对立的经济世界之间,为使勒旺贸易的大门在

① 郭连成《面向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概念、成因、回顾与展望》,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卷中译本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③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页。

几个世纪里始终洞开,这要具备多少条件……假如事先没有长时间的准备,好望角之路的发现便是不可思议的”。他在援引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论点后,表示了不同的见解:“在我看来,欧洲经济世界诞生很早,而且我不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那样,两眼盯住16世纪。”^①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德裔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他那引起国际学术界震动的著作《白银资本》的副标题就叫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是1500—1800年,在他看来这几个世纪中已经存在“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就不会引出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贡献在于,他批判了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或“经济世界”)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1500—1800年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的经济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他说:“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甚至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弗兰克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强调了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2、4、44页。

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①。

对于弗兰克的新论,各国学者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争论的焦点在于欧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强求一致。但是他所提出的研究 1500—1800 年历史时应当“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这一观点,却是无可争议的。因此笔者把本书的导论定名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本书所界定的晚明,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说法。上起万历元年(1573 年)下迄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处在地理大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视角大异其趣,或许会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中国竟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与传统的中华文明进行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并且把传统儒家典籍和中华文明介绍给西方。这一切对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外部的良好环境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与珍惜,一切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这当然是进入清朝以后才逐渐让人们看到的变化,但晚明时代已经初露端倪。本书的宗旨便是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明朝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覆亡的历史。

一、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与晚明社会

1. 新航路的发现与葡萄牙人的东来

欧洲大约于 1300 年开始了商业革命,两个世纪以后,海外探险的航行十

^①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 27、166、167、169 页。

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西班牙、葡萄牙都想在和东方的贸易中占一席之地。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是无法估价的。首先是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事业,航海大国的船只在历史上首次航行于七大洋;其次是商业额和消费品种类大量增加^①。

15世纪最后25年,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便明显地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巴托洛缪·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奉命率领三艘船于1487年8月离开里斯本,从海上探寻通往印度的道路。1488年底,迪亚士回到里斯本,带回了围绕非洲大陆顺利航行和打开通往印度之路的消息,促使国王约翰二世作出准备进一步探险的决心。1496年12月新国王曼奴埃尔(D. Manuel)一世在御前会议上提出了继续探险的打算。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四艘船由里斯本起航,几个月以后在好望角附近的海岸登陆,然后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到东非的马林迪,再由马林迪越过印度洋抵达印度的海港。1499年7月10日伽马返回里斯本。他所探寻到的新航路使一百年来来的努力圆满结束,也使葡萄牙奠定了它在东方的基础^②。在印度西海岸的港口,伽马采购了印度的土产珍珠、胡椒、棉布等商品满载而归,巨额利润高达资本的60倍。4年之后伽马再次率领船队来到印度,带来的资本约240万法郎,归国后带回去的货物变价到1200万法郎^③。16世纪初,葡萄牙人用武力侵占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即《明史》中的满刺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马鲁古群岛(Moluccus Islands,按:马鲁古,《明史》称为美洛居)。

明朝与马六甲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1403年明成祖(永乐皇帝)派遣尹庆到马六甲,马六甲的统治者对这一行动作出反应,于1405年和1407年派遣使节向明朝皇帝奉献贡品,要求明朝承认他的国家为明朝的藩属。郑和下西洋时曾经访问马六甲,马六甲与明朝之间于1409年开始建立起一种松

① 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世界文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3~225页。

② 波特(G. R. Potter)《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62~567页。

③ Charles de Lannoy, Herman van der Linden, *Histoir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des Peuples Europeens; Portugal et Espagne*. Bruxelles et Paris, pp. 191 - 192. 蒋廷黻《中国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载《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1934年)。

弛的政治联盟。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当时是国际贸易的中转地,也是南洋群岛海上一大要塞。葡萄牙人攻占其地后,成为葡萄牙在东方的要塞及国际贸易根据地,成为当时世界上香料分配的一大中心。葡萄牙人由此出发,一面控制香料群岛,一面遣使通好附近诸国,进而遣使北通中国^①。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对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极为觊觎,1508年他给探索东方的官员下达指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数量与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② 药材代理商出身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1512年到达马六甲,在葡属印度总督亚伯奎(Albuquerque)手下任商馆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1516年2月他以葡萄牙第一任使节出使中国。在此之前他在马六甲四处搜集东方各国的情报,并于1515年编成《东方诸国记》,呈献给葡萄牙国王,为向东方发展的决策提供依据。看看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是饶有兴味的事。书中写道:“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且又十分富饶的国家”;“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为本色生丝,数量甚巨;大量散装的彩色丝绸,各种颜色的缎子,五颜六色带格子图案的‘恩罗拉多斯’锦缎,塔夫绸与薄如蝉翼的纱(Xaas),以及其他各种五色缤纷的丝绸。大量形状各异的小珍珠,其中绝大多数珍珠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中国人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圆形珍珠,照我看这种珍珠在中国是与丝绸同等重要的商品,尽管他们将丝绸视作主要的商品……上述这些帆船自中国航海抵达马六甲后,中国人无须交纳关税”;“(中国人从马六甲运回的商品)大宗的商品为胡椒——中国人每年要购买十船胡椒,如果能有许多胡椒运往中国的话——丁香、少量的肉豆蔻,一些木香和儿茶。中国人还大量购买熏香、象牙、锡、药用芦荟、堆积如山的婆罗洲樟脑、红色的烧珠、白檀、苏木、不可悉数的新加坡出产的乌木、为数甚巨的坎贝红玛瑙、鲜红色的羽纱以及彩色的羊毛织品。除了

^① 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原载民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转引自《明史论丛》之七《明代国际关系》,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8~11页。

^② 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收入其所著《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

胡椒之外他们对所有其他商品都不太重视”^①。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时代中国人笔下的“佛郎机”就显得有点影影绰绰了。郑若曾说：“刑部尚书顾应祥云：佛郎机，国名也，非铙名也。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年）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募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甲必丹，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②素来精通海外事宜的严如煜对“佛郎机”也不甚了了，他说：“佛郎机在爪哇南……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澳口，铙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右布政使兼按察使吴廷举许其进贡，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遂退泊东莞南头，泾盖房树栅以自固。”^③黄衷说：“满刺加在南海中，始为暹罗国，厥后守土酋长叛其主而自立……正德间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其‘哪咤’而囚之。佛郎机人归诉于其王，议必报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至，时已逾年，国中少备，大被杀掠，佛郎机将以其地索赂于暹罗而归之，暹罗辞焉。佛郎机整众满载而去，王乃复所。”^④

以上所言就是1517年由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领的一支葡萄牙舰队，载着使臣托梅·皮雷斯在广州城外的珠江抛锚下泊并请求通使之事。广东地方官上报朝廷后，遭到明确的拒绝。在《明实录》中留下如下记录：“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⑤但是皮雷斯买通广东地方官，继续钻营，终于获得进京的许可。皮雷斯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进入北京，由于同年年底满刺加（马六甲）呈送的求救表文到达北京，

① 托梅·皮雷斯《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74~289页。此文由夏茂译自阿尔曼多·科特桑辑《托梅·皮雷斯的东方诸国记》(Armando Cortesa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伦敦，1944年，第1卷，第116~128页。

②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经略三》。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指出：此处所谓“船主甲必丹”即葡语“船主”(Capitao Mov)之译音，并非人名。

③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24《洋夷市贡》。

④ 黄衷《海语》(岭南丛书之一)。

⑤ 《明武宗实录》卷158，正德十三年正月壬寅。

明朝君臣获悉这帮“佛郎机”^①东来的意图，以及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在那里劫夺财富、掠买人口，便在次年把皮雷斯遣返广州，并在广州逮捕监禁。这就是《明史·满刺加传》所说：“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按：即该国苏丹马哈茂德）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羈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值遣归。”^②

英国历史学家博克瑟(C. R. Boxer)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宝贵的，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他们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是绝对办不到的。故而，在随后的三十年内，佛郎机继续游弋在中国沿海，他们有时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进行贸易，有时则完全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里。由于最初是在广东相当严厉的执行那道明王朝禁止其贸易的诏令，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向较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与浙江，他们在那儿隐蔽、无名的诸岛屿及港湾内越冬。在这些暂时的居留地中，最繁盛的要数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及位于庞大的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和月港……后来在圣·约翰岛(上川岛)、浪白澳的那些年内，以及在澳门的头两三年内就是这么进行贸易的。”^③

博克瑟所说是可信的。葡萄牙人从1524年起，就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他们盘踞的浙江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就是一个大规模走私贸易的据点。双屿岛孤悬于定海县六十余里的海洋中，岛民早在明朝初年已经内迁，长期无人居住，其地势极有利于走私贸易。中国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首领许栋、王直、李光头等(即明朝政府所谓“倭寇”)，以此为据点长达九年之久，在那里贩卖私货。葡萄牙人在那里栖息越冬，许栋、王直之流从葡商手中买进从非洲、东南亚、欧洲带来的货物，再转手倒卖，并且从葡商手中购买先进的武器来对付明朝官军。从1524年到1547年，葡商在双屿岛

① 按：佛郎机就是 Frank 的音译。自十字军东征以后，近东人概称西欧人为 Frank，此名遂随阿拉伯商人传到印度，再由印度传到南洋和中国。

② 《明史》卷 325《外国传·满刺加》。

③ 博克瑟《佛郎机之东来》，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4 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此文由钱江译自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 的绪言。